

# 湖北妇运史资料

(抗战时期专题资料)

(4)

湖北省妇女联合会编

## 前 言

本期主要是反映史沫特莱，抗日战争时期在湖北支持我国抗日战争和妇女运动的情况。文中引用了蔡斯烈、孙光珠、王瑞华及郭令忻等同志文章的内容，并得到鄂豫边区革命斗争史编辑部朱虹、陈昆满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谢忱！

由于我们搜集资料不广泛，对史料考证也还不够，加之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文中错漏之处难免，敬请同志们修正、补充。

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小组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日

# 一位热心中国妇女运动的 国际友人

## ——史沫特莱在湖北活动片断

史沫特莱是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妇女活动家。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促进各国人民和妇女建立广泛友谊与合作的先驱之一；是“一个为历史的进步发展献出了一生的女性”。

一九二八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延安，在山西前线做过战地救护工作，在武汉负责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工作，一九四〇年初，是第一个访问鄂豫边区的外国记者。一九四一年返回美国。在中国期间，她不仅是“中国历史过程的目击者，而且是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的参与者”。她撰写了《伟大的道路》、《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攻》、《中国的战歌》等反映中国人民伟大革命斗争的著作。这些著作和她的伟大国际主义行动，曾吸引和感染了许多外国友好人士，同情和支

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她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过“书不胜书”的好事。周恩来同志曾对她说：“感谢您对中国人民的帮助，请允许我以朱德同志和我个人的名义，再一次感谢您为中国抗战所作的巨大努力。”一九五〇年她病逝后，遵照她的遗嘱，一九五一年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为她建墓立碑，朱德同志题写了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纪念抗日战争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仅记述史沫特莱抗日战争时期，在湖北支持中国妇女运动的活动片断，以表示对这位热心中国妇女运动的伟大国际友人的深切怀念！

史沫特莱“这一位出身于美国贫困的矿工之家，被严酷的现实早早唤醒了，作为底层劳动者和妇女的反抗意识，从十几岁就决心摆脱由她那过度劳累而早死的母亲和沦为娼妓的姨母所体现的苦难命运，为争取双重的解放而奋斗的旧世界的叛逆”。她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十分热心。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是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妇女工作大纲》指出：（一）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二）经过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特别注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为我党妇女工作的路线；（三）在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以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为妇女斗争纲领。史沫特莱为贯彻我党这条妇女工作路线，作了很大的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一、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促进妇女界统一战线的发展

一九三八年初，南京沦陷，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八路军办事处也都设在武汉。中外各界著名人士也都云集在这里。这时，武汉不仅是全国抗日民族联合统一战线的中心，也是国际、国内各种势力斗争的中心。加之，十年内战中，国民党进行反共宣传，许多外国人士和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以及抗日的主张都不很了解；对沦陷区人民和妇女，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蹂躏的悲惨遭遇体会不深；甚至“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共妻”等反共宣传还在欺骗和蒙蔽群众，妇女群众还未广泛发动起来。针对以上情况，邓颖超等同志领导下的长江局妇委，认真贯彻我党在国统区的妇女工作方针政策，建立和发展妇女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一切公开的合法的组织和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主张，统一群众的认识，争取中外舆论界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妇女群众参加国防生产、募集资财、救护慰劳，坚持抗战到底。当时，在武汉的外国新闻记者约四十名，而史沫特莱则是一位以鲜明立场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热心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

史沫特莱，一九三八年元月来武汉后，她利用一切机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介绍她在山西前线的所见所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赞扬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英勇抗日的事迹，动员中国人民和妇女团结起来，

投入抗日斗争，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为增进中外人士对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了解，为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抗战初期，汉口女青年会是“妇女界联络中心点”。史沫特莱应汉口青年记者的邀请，在汉口市女青年会演讲。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日报》报导：“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此次由前方来汉，本市青年记者协会，特请史氏于昨日下午二时在女青年会演讲，史氏报告前方所见情形，甚为详细。谓日本决不能战胜中国，又云日军曾亦仿效某路军组织游击队，但为我军完全消灭，因无民众基础，游击军决不能奏效也。故某路军有一流行语云，军队是鱼，民众是水，得民众即如鱼得水矣，又云前方极需物资接济，史氏到此，已募捐一批送去，甚望各界踊跃捐输。”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以表示妇女界对此次暴日侵略中国之态度，并藉此唤起在汉外侨，及外国新闻记者对抗战深切之注意。”(1)中国妇女各团体联合会在假金城银行楼上举行盛大茶话会。由妇女慰劳会曹孟君、妇女生活社沈兹九、量才图书馆程远、汉口女青年会陈纪彝、汉市妇女慰劳分会庄静、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驻汉代表刘清扬，及陈逸云、安娥、张蕙贞等妇女界领袖招待在汉中外妇女及新闻界到会的除武汉各妇女团体代表外，还有外侨妇女，外交官、商人、学者、新闻记者、传教士等三百余人，是武汉抗战以来空前盛大集会。国共两党妇女代表张蕙贞、刘清扬先后在会上演讲。会上由张蕙贞宣读了会

---

(1)引自1938年1月24日《新华日报》

议宣言。宣言的内容要求到会外界人士，对于下列四事施以援助。一、向各国国内发起广大募捐运动，援助中国伤兵及难民，医药用品尤为需要，二，向各国政府请求物质援助；三，请友帮各国派遣技术人员来华服务并组织视察团来华考查；四，扩大抵制日货运动，请各国政府勿借款助日并禁止运送军火及其他军用品前往日本。宣言宣读后，史沫特莱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无限的热忱和希望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她以鲜明的立场支持刘清扬等妇女代表的讲话及会议宣言的内容，并以她在前线见到的事例来充实。她在演说中，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山西前线侮辱妇女的罪行。她说：“敌军入据太原城后，即勒索妇女三千名以共取乐”。②她呼吁“到会人士发动全世界舆论，抵制日本及其帮助日本国家之货物”。③她还指出：“中国之抗战，不仅为民族生存之战，也为世界之正义与公理而战”④

史沫特莱除了在会议上讲演外，还通过发表文章，与朋友间的交往等渠道，积极进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方面的宣传。她的这些努力对争取国内外舆论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发展国内外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起了促进作用。当她向汉口基督教圣公会鲁迟主教和他的女儿蒂兰西丝小姐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艰苦抗战的情况后，鲁迟主教父女深为感动。从鲁迟主教以及他女儿、吴福兰、法约翰给八路军写的慰问信中，充分显示出史沫特莱在舆论宣传方面发挥的作用。汉口鲁迟主教在信中说——“山西等八路军：

---

②③④引自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武汉日报》

各国的中国友人们，从史沫特莱女士那里听到，你们为着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正在进行努力而且在精细的计划的工作。我是住在中国的一个外国老人，是中国的朋友，我写这封短信，向你们表示敬爱。

鲁迟（主教）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于汉口”⑤

弗兰西丝等三女士信中说——

“诸位亲爱的朋友同志：

在最近一个星期中，我们很荣幸的听了许多关于八路军和游击队在西北的英勇抗战，使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爱护同胞祖国的诚恳克己的精神，极其钦佩。

诸位所表现的这种克己为人的精神，是全世界伟大的革命家共有的。诸位的榜样是我们所敬佩的，是我们所要追随的。

本着这种精神，有许多位各国的朋友联合起想帮助使各位将士及游击队在这个伟大的工作略得一点物质上的安慰。我们同人已捐募了一万〇三百元的现款请彭德怀同志送上。这笔款，希望能拨一万元即刻交给游击队作为购制手套和食品或药品或其他急需的物品。其余三百元是为购布使当地的妇女自制布鞋供战士用……

吴福兰

鲁迟小姐

法约翰”⑥

---

⑤⑥引自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新华日报》



史沫特莱的宣传吸引和感染了许多中外人士积极声援八路军在 frontline 抗击日寇。“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有外国教授、医生、记者、传教士等参加的国际代表慰问团如期组成，并随带两卡车物资辗转到达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代表团的成员对前来欢迎的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丁玲同志说，他们非常感谢史沫特莱女士，因为她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们，使他们知道这里的八路军在艰苦的条件下正在英勇抗击日寇，这才决定前来慰劳。波兰女记者苏支说：“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我在日内瓦只听到日本的单方面宣传，无法了解真实情况，直到武汉见到史沫特莱，我才知道八路军在艰苦抗战。”

在国内外爱国友好人士，一致要求团结抗日正确舆论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经过我党大量的团结、争取、教育工作，宋美龄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愿意同各党派及社会各界妇女团结合作，一致抗日。

第一，宋美龄同意、支持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这是第一个在武汉建立的，对国统区妇女运动影响较大的，妇女界统一战线组织。它使国共两党、社会各界妇女领袖和头面人物加强了联系，为进一步广泛建立妇女界的统一战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为了抢救“难童”，解除前线抗日将士后顾之忧，组织妇女投入救亡运动，在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下，经过方振武、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沈兹九、史良、安娥、杜君慧、徐镜平等一百多人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并由李德全和

---

⑦引自《楚辉》第四辑《史沫特莱在武汉沦陷前夕》一文

· 安娥敦促宋美龄支持和参加这项工作（因为在国统区要成立一个群众团体，一定要经过当局有关部门严格审查）。武汉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文化界，纷纷写文章，发消息，掀起了“救救孩子”的高潮。这时，宋美龄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推动下，同意建立中国儿童战时保育会。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在汉口圣罗以女中成立。大会选出了五十一名理事。由邓颖超、孟庆树、曹孟君、沈兹九、史良、杜君慧、陈纪彝等十余人组成中国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付理事长。由于中国儿童保育会有女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妇女参加了领导工作，这对我党在国统区开展妇女儿童工作十分有利。

第二，宋美龄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庐山召开了妇女界谈话会。我党派邓颖超同志和孟庆树，作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她们在会上阐明了我党关于坚持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情况，递交了我党关于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意见书，指出了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基本方向和中心任务，并提出四点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妇女大众生活；开展妇女救亡运动；培养大批妇女干部作为抗战骨干。这次会议制定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发表告全国妇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奋起救国。还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决定把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扩大为联合各党派，各阶层妇女抗日的全国性组织。从七月一日开始在汉口三教街第五小学内办公。这个委员会设立了八个组（总务组、文化事业组、训练组、农村服务组、战地服务组、慰劳组、儿童保育组、

生产事业组)各组都有女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妇女在里面工作,而且有的还担任了领导工作。如:刘清扬担任了训练组的组长,史良担任联络委员会主任,沈兹九担任文化事业组组长。曹孟君、罗叔章、杜君慧负责儿童保育组的工作。

在这些统战组织中的女共产党员,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不为名利,埋头多作实际工作,凡抛头露面的事,尽量让宋美龄等出面,并对他们每做一件有益于抗战的事,就宣扬。遇到矛盾,只要不影响抗日,就暂时作些让步。如:在中国儿童保育会进行组织机构人选时,庄静等国民党妇女代表不同意邓颖超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邓颖超同志在会上坦率地说:我们是为抗日救国,为保护儿童而走到一起来的……不是贪图什么名义,我不要任何名义,只要工作需要,我一定努力去做”。接着曹孟君、沈兹九也在会上表态都愿退任付职。张藻贞是宋美龄的代理、总慰问部部长。我党地下党员冯光灌是张的秘书。“张的发言稿和每天的工作日程很大部分是她代为拟定的”。她工作踏实,很大程度影响了张的方向和工作作风。”我党就是充分发挥这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妇女的作用,团结、教育、争取中间努力,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正因为这样,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培训妇女干部,抢救和保育儿童,慰劳救护伤员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在后方甚至国外荣誉很高。”(8)妇女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很好的形势。一九三八年八月分,在武汉已有“三十余个妇女团体”<sup>⑨</sup>投入保卫大武汉的斗争。这是继大革命以来,武汉妇女运动出现的第二个高潮;国共两党合作,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又放出了一个异彩。在总结这段妇

女工作时，邓颖超同志说：“妇女们的合作确实是很出色的。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基督教徒还是共产党人，不管是持有新思想的人还是保守的人，我们妇女现在考虑的，只是怎样才能好好地配合前线。”<sup>⑩</sup>

英国著名进步作家、新闻记者、妇女活动家何登夫人，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在新运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及儿童保育会等妇女团体招待她的会上，发表演说，赞扬中国妇女努力抗战，出乎欧美人民意料之外。还说，中国妇女能切实合作，使人打破过去轻视妇女观念。

这一切都是我党在妇女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史沫特莱进行了大量的舆论工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二、竭尽全力联络中外妇女募集资财 救护慰劳促进妇女运动深入开展

募集资财、救护慰劳伤员是国统区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控制的战时医疗体系几乎损失殆尽，只有十七辆车各载半车药品撤退到武汉。”<sup>⑪</sup>当时不论前方和后方都缺医少药，而且国民党部队的一些军医政治和技术素质都差，常常不顾伤员死活。有的

---

⑩引自人物（妇女增刊）《我和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一文

⑪引自1938年8月7日《新华日报》中《武汉妇女积极动员保卫大武汉》一文

“伤员收容所，那里活象一幅地狱图。⑩”伤员得不到治疗和护理，甚至有的“伤员在街头呼号行乞，坐以待毙。”

史沫特莱从前线到后方见到士兵受伤后得不到救护的悲惨情形，一种革命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促使她竭尽全力，到处奔走呼号，联络中外人士和各界妇女，开展救护慰劳伤员，改善中国战时的医疗条件。史沫特莱的这一伟大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有力声援；对中国的妇女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首先，她一到汉口后，就积极向社会宣传前方缺医少药，伤员需要救护的情况。她曾向汉口《新华日报》记者说：“我从前线到汉口，还没有几天，前线的士兵，都是体格很强健的青年，他们的英勇，可以说是在中国，在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但是，伤兵的护理问题，都是非常严重。前线后方，都缺少药品和医生。我常到伤兵医院去慰劳伤兵，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要设法止痛。他们呻吟着，有时呼号着，可是，吗啡之类的止痛品很少。我所有的安眠药都送给了伤兵，我只有听他们喊叫着，而一点办法都没有，哎，那时的心理是多么难受啊！”

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五日《新华日报》转载了她的这段话。她还同王安娜经常将“红十字会的情况以及伤病员和难民问题的有关报告，送给保卫中国同盟”⑪以便通过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个组织向世界各国呼吁，

---

⑪引自楚暉第四辑

⑩⑫引自王安娜《我的第二故乡》

求援。

第二，积极组织募捐。史沫特莱与鲁迟主教女儿希兰西丝组织了一次盛大的茶会替八路军募捐。

第三，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创办战时急救训练学校培训医护人员。王安娜曾回忆说：“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到汉口后，她一贯具有的充沛精力得到发挥，尽力协助红十字会的工作”。<sup>⑭</sup>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一九三八年二月底，她经友人介绍，同国联派到中国的卫生顾问、南斯拉夫公共卫生专家博克伊克和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负责人林可胜等会晤了。她同她们经过反复磋商，决定以苏联捐中国红十字会十万元经费作基金，在中国红十字医疗队的名义下，筹建若干个由十五、六人组成的医疗小分队，附属在各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并在长沙创办战时急救训练学校培训医护人员”。<sup>⑮</sup>

为了这项事业，史沫特莱克服了许多困难，作了种种努力。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说：“从那时起，我便作为一个宣传工作者（乞丐的一种美名而已）参加了红十字会医疗队。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聘我为特派记者，约定每周写两篇文章，这一工作持续到一九四一年我离开中国为止。他们给我的稿酬足以维持我在红十字会义务工作期间的生活费，甚至还能捐点钱给医疗队。我最初写的文章，就是关于伤员，关于军队医疗工作，关于红十字会无穷无尽的困难的。我也向世界各种组织机构写信，请求支援卡车、救护车、汽车和外科用品等等。”在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发展

---

<sup>⑭⑮</sup>王安娜引自《我的第二故乡》

中，由于史沫特莱的积极争取，曾得到美国大使馆陆军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美国海陆战队情报官伊万斯·卡尔逊上尉，美国总领事约翰·戴维斯，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寇尔爵士等来华外交官和中外各界人士的赞助。特别在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史沫特莱得到了她的密友、香港政府医务处长夫人希尔达·赛尔温的帮助。

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最初只建立了十七个医疗小分队，这些小分队分配给武汉外围前线的几所野战医院不久，就因医疗器械和药品短缺而无法开展工作。这时，史沫特莱给赛尔温写信求援。当赛尔温接到史沫特莱的信，“应邀飞抵武汉，参观了几所医院之后，她为中国伤员的悲惨境遇震惊不已，决心尽力支援中国。回香港不久，她就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国外援助会，募集到大批捐款送来，以后还建立了国际联络网，突破日寇封锁，把医药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医疗队。”<sup>①⑥</sup>此外，史沫特莱还去信动员在印度尼西亚爪哇的华侨并说服宋子文为红十字会医疗队提供经费，这样才使一度濒临困境的各医疗小分队，重新开展工作。

为了迅速培养医护人员开展救护工作，史沫特莱十分关心长沙红十字学校的培训工作。她同史迪威多次往来于武汉与长沙之间，视察战地医院和战时急救训练学校。一九三八年八月上旬，她写下了许多调查提纲，同史迪威、王安娜等组成一个经长沙往前线去的小组，他们冒着酷暑和尘埃，经过十五个多小时的长途旅行，去访问新设在长沙的那所以培养红十字工作人员为目标的学校。”这个学校，培养了几百名青年男女，分成小组，送到前线，工作都很出色。

在史沫特莱和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各组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战地救护工作迅速得到改善。王安娜在《我的第二故乡》中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夏天，已有五十八个红十字队活跃在各个战区。后来，我常常与这些红十字队见面。在许多地方，他们的工作，他们那种献身精神，在各种困难面前都不屈服的乐观主义精神，使我惊叹不已。”

第三，她积极动员男女青年踊跃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在中国学生救国团约集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回教大众会、回教青年抗敌协会等团体召开的会议上，史沫特莱激动地发表演说，介绍了她在前线看到的伤员急需救护的情形，号召青年踊跃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到军队中去作救护工作。她说：“这不仅仅是人道的问题，因为多多救护伤员可以提高士兵的勇气，增强士兵的斗志，而且知识分子到军队，可以增进士兵的知识”<sup>⑮</sup>。她的动员得到爱国青年们热烈响应，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不久又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

史沫特莱的这一切努力，有益于武汉和国统区的妇女运动从笔墨的工作，口头的工作走向切实工作的路上去了”<sup>⑯</sup>特别是募捐救护慰劳工作，在长江中央局和湖北省委的领导和史沫特莱的大力援助下，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在“九、一八”前后已形成高潮。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张藻贞对《新华日报》记者说：“……现成立慰劳分会的已有缅甸、瑞士、伦敦、纽约等近十个地方，送来的东西是非常多……国内海外集中在慰劳总

<sup>⑮⑯⑰</sup>引自楚暉第四辑

<sup>⑱</sup>1938年10月6日《新华日报》



会物品已不能详其数。至于现金，七个多月来，已有十八万三千多元。这样巨大的数目，每点每滴都用在抗战将士身上去了。总会慰劳将士的次数，在一百次以上。浴血抗战的将士不知受了总会多少帮助。……”。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新华日报》报道：“中国妇女慰劳会，前推定前线慰劳代表沈慧连、张蕙贞、唐国桢、陈逸云及陈婉慈等五委员，昨（九）日下午三时在该会，商讨购买慰劳品办法，当决定由慰劳除部购备鞋子五千二百双，袜子三百四十打，雨衣、雨帽各一千套，内衣一千套，请第五路军驻汉办事处转送前方外，并决继日购买前方将士所急之帐子、席子、内衣等物……。又该台儿庄受伤将士，在汉阳天主教堂医院，及第四休养院休养者甚多，故特制内衣二千套，肥皂三千条，前往慰劳，并由该会汉口分会组织洗衣队、写信队，每日前往各伤兵医院服务。”有的妇女团体还组织培训救护人员。汉口妇女生活读者图书室负责人沈兹九主办妇女救护速成班，凡粗识文字，富有爱国思想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妇女皆可参加。

当时群众中抗日的情感和积极性很高，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一日《新华日报》报道：“孤儿寡母、工厂艺徒都节约生活费捐款”。难童也参加献金救国。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新华日报》报道：“战区儿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在中山路慈善难民收容所内）以从事擦皮鞋工作收入抽出一部分作为购买救国公债之用，二月以来，已积十八元一角五分，特于昨日下午送交大公报馆代收，转交政府……。”为此《新华日报》发表一篇“难童献金”的短评，赞扬难童的爱国精神和儿童保育会工作的成绩。短评